

近10年内，国内有300家以上景区对名称进行过修改

# 景区“改名”，能否“改运”

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  
本报通讯员 彭祥津

“处处又见人从众。”刚刚过去的“五一”假期，见证了旅游市场的不断回暖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，这个加强版“五一”假期，国内旅游出游2.3亿人次，同比增长119.7%，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103.2%；国内旅游收入更是同比增长138.1%。

旅游产业的强劲复苏，同时意味着旅游市场竞争正日趋激烈。A级景区都想更“抗打”，中小民营景点也希望“好好活下去”，经营者们都在寻找迅速吸附游客的方案。“更改名称”，被视为一个“实在”的选项。有人对比历年《中国旅游景区资讯通览》的景区名录发现，近10年内，我国有300家以上景区对名称进行过修改。其中，江苏、四川、山东、广东、陕西等旅游大省的数量较多，占据了全国更名总量的前五位。

俗话说，题好一半文。叫得响、立得住、传得开，名字，无疑是景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。传统公共资源的景点名称，往往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意涵或是民族风情，是其自带的优势基因、天然的资源禀赋。寒山寺、雁荡山、神女峰、凤凰古城、稻城亚丁……只一听就令人神往，细探究还流传着一段故事。这样的名字，是景区最珍贵的财富之一，自然不会改。

谋求变化的，多是些“不甘心”的旅游地。改名，成为其寻找“生存焦虑”疏导的出口。

“评级”是考量之一：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，2011年至2019年间，全国A级景区总数增长约4.9倍，2019年3A级景区的数量较2011年增长近12倍，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。根据文旅部资源开发司相关发展报告显示，2019年全国5A级景区获得的平均旅游投资为1682.64万元，是4A级景区的3.08倍，1A级景区的29.67倍。能以“改名”促“提档”，收获更大效益，无疑是优先考虑的申报策略。



天下第一泉——趵突泉

云水谣古镇

昌邑“发大牛”活动，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从中看一段文化渊源——

# 孙膑在此写书

说古论今

□ 本报记者 谭佃贵  
本报通讯员 刘祐 王玉龙

在昌邑市都昌街道永安村至龙池镇瓦城村一带，当地民众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，即每年正月十四自发组织祭祀我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，其表现形式——“发大牛”活动，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。

这一带地处偏远，历史上是一处水天漫漫的泽国野郊水乡，既不是历史记载的孙膑出生地，也不是险要的兵家争夺之地，这里与孙膑有什么渊源？

## 功成名就后退隐乡野

昌邑城区向西偏北10公里，有两个村庄，一个叫“永安东”，一个叫“西永安”，红瓦白墙整齐排列，绿树花草掩映街巷，村外是广袤的农田。每年农历正月十四，这两个昌潍平原上的看似普通的村子都会有一场群众自发组织的“发大牛”祭祀活动。这个传承据说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，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孙膑有关。

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，孙武的后代，因“田忌赛马”“围魏救赵”等历史典故脍炙人口，“桂陵之战”“马陵之战”等著名战役更让他战史留名。作为历史上武功卓著的名将之一，他被供奉于武成王庙内，宋徽宗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，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，另外还有制鞋、皮革等五个行业尊孙膑为祖师。

据史料记载，功成名就后的他急流勇退，隐居乡野，希望通过著书立说将军事主张传承后世。历史上，昌邑曾是孙膑的封地。据传，孙膑曾在东永安村西土埠上居住过，并写下千古名著《孙膑兵法》。

这期间，不乏成功案例。济南的“天下第一泉”景区即是如此：曾经，受5A级景区面积“硬杠杠”的约束，整合一河、一湖、三泉，定名“天下第一泉”，实现抱团冲5A级已势在必行。申报成功至今，相关旅游数据持续向好，以今年的“五一”假期为例，接待游客达105.5万人次。更名，让“天下第一泉”成为了带动济南大旅游格局的“龙头”。

“盈利”是考量之二：山城重庆有个“石夹沟景区”，风景宜人。起初，门票只有20元。2012年，当地正式更名为“武陵山大裂谷”，如土鸡变凤凰，门票一下翻了八倍，涨价力度令人咋舌——改名成了为高票价背书。

也许正是这种“改名的套路”，常引来质疑或是吐槽。我们或许可以作个多角度的讨论——“改名”是不是具有使景区“改运”的价值？

“更换名字，是市场类的景区企业施展的包装、营销策略之一，且慢安下定论，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并不可取。”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认为。

的确，改名如换刀，收点石成金奇效的，在旅游界不乏其例：1984年，曾经寂寂无闻的新安江水库，化身“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”，短时间内知名度大大提升，直到今天还是大热的旅游目的地，改名也被称为“史上最牛”；知名电影《云水谣》曾在福建省南靖县长教村拍摄，福建土楼申遗成功后，为借电影树立品牌，当地将鹅卵石古道命名为“云水桥古栈道”，把长教村改作“云水谣”，巧妙营造了“代入感”“诗意美”，“古镇一夜成名”……

但改名也是双刃剑，首先体现在，谋划不好也会适得其反，改名未成佳话反成笑话的例子也有很多：从“小龙山风景区”到“巨石山生态旅游风景区”再到“呀子哟旅游度假区”，地处“黄梅戏之乡”安徽安庆的这处景区，短短几年内三度变换名称，彻底“绕晕”了游客；湖南省临武县给生平无奇的“水池+镜子”，重新冠名“天空之镜”，游客蜂拥而至却见“翻车现场”；河南的“倒回沟”，名字土则土矣，但却充满

探索的未知感，更名成“天河大峡谷”后，反而门可罗雀。此外，美国大片《阿凡达》风靡全球，取景地张家界举行仪式，将“南天一柱峰”改为“哈利路亚山”；电视剧《琅琊榜》热度高涨，安徽琅琊山景区干脆把最高建筑“会峰亭”更名“琅琊阁”……都不免让人有弄巧成拙的感受。

可见，改名其实也是含金量十足的“技术活儿”。圈内专家有改名“攻略”：改名，要改得合乎实际、要雅俗共赏、要朗朗上口，不求奇求怪。“具体说，要方便传达景区的自身亮点，实现各景点内容格调的和谐统一，同时便于记忆和表达。在事实基础上，可以对语言进行艺术加工，创造一种韵味无穷的语言美。此外，一定要避免‘撞车’，合理‘搭车’。比如，一味地打着‘小桂林’‘小江南’等旗号，可能难以形成特色，反给他人‘作嫁衣裳’。”

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李辉看来，景区名称往往记录了社会历史的变迁，凝结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沿革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既是当地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的直接反映，更代表着景区的综合实力和整体形象，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。“景区更名要慎重，充分征集和考虑当地群众的意见，从消费者的文化体验出发，结合当地特色，尊重当地传统，全面展现景区形象，达到增强游客体验度，强化游客认可度、增加景区品牌附加值的目的。同时，也要植根历史底蕴，重视品牌的个性化创新才能实现景区品牌历久弥新。”

相对于谋划失策，更不值得提倡的是改名本身就动机不纯——“更多时候，改名容易沦为一味追求所谓的终南捷径，做成廉价口号，只能徒劳消耗游客的信任和耐心，会对整体旅游业带来不良口碑。”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、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德刚指出。

事实上，改名之举常出现于中低端景区，有研究显示，国内大部分的旅游景点重游率不足1%，这就使部分低A景点、民营景区，并不重视游客忠诚度的培养，在诸多景点内容趋同化的背景下，相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、深挖历史文化内涵的费时费力，通过改名营造“爆点”往

## 每年都有“发大牛”祭祀活动

据村里人讲，该村在明朝时便有孙膑庙，自建庙起，人们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军事家，便把正月十四孙膑生日定为孙膑庙会。每年这一天，村里都要隆重举行“发大牛”祭祀活动，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，参与民众最多时达数万人。

当地民间流传，孙膑因腿疾无法行走，经常骑一独角牛巡视乡里，体察民情，故后人筑庙以示纪念，庙内曾铸有独角铁牛。清代昌邑举人吴克思曾写独角牛歌：“瓦城社，孙子宫，孙子神牛亦英雄。独角日行八万里，花蹄往来如生风……”

从正月初六开始，东永安村的村民用当地产的棉槐条、葵花杆、高粱秸等扎制独角大牛。整个过程需要140多道工序，扎制好的大牛高5米，长10米，独角长2米多，俨然是一件精致的巨型艺术品。

正月十四上午，一阵鞭炮响过后，大牛“起驾”。整个“发大牛”的队伍浩浩荡荡，前面由鞭炮队开道，其次是锣鼓队、秧歌队、高跷队、舞龙舞狮队，再就是二十多位青壮年组成的抬大牛队伍，最后是跟随游行的拥挤的乡民。一路上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每每巡游队伍经过，乡人都会抱着小孩争相摸牛，还说着说：“摸摸牛角不生病，摸摸牛角不生病”。生病的来摸摸牛身，乞求神牛将病带走，无灾无病的也往牛腿上拍一拍，并自言道：“拍拍牛的腿，一年不生病。”

“发大牛”还俗称“烧大牛”，在正月十四上午11点之后举行。村民将大牛抬至早已备好的香纸堆上，口念“孙老爷”名号，嘱大牛莫要“惊驾”，直到村中的组织者高喊一声“发”，牛身迅即被点燃。大火燃烧的那一刻，数万人群情沸腾，村民认为，只有“大牛”焚化升天，才能将人间的虔诚之心和所要表达的愿望传达给真神孙膑。

据考证，在古鄆邑区域即今昌邑永安村、渔埠村以及龙池镇的瓦城村，先后都建有孙

子庙，并相应传承纪念祭祀孙膑的活动，虽然几处孙子庙祭祀纪念活动的方式不尽相同，但均虔诚、隆重、规模宏大，时间都是每年农历正月十四。

除了“发大牛”，龙池镇瓦城村的纪念祭祀活动中还有“进旨”和“演旨”等程序（“旨”就是木雕的孙膑像，也称“驾”）。当日各村齐向瓦城孙子庙进“旨”，路上各村口接“驾”、演“旨”，武耍，戏耍争相亮相，舞狮、耍龙、跑高跷、跑旱船，各种民间杂耍，应接不暇，香客多来自黄县、平度、潍县，最盛时约有十万人。其始于何时已不可考究，但这些纪念祭祀活动以及各处的“进旨”“演旨”等民俗文化现象，经历了重重历史风云，仍延续至今，是少有的文化传承现象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认为，“发大牛”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和民间信仰，蕴含着多种村落知识，如扎制技艺、艺术表演、信仰等，并由此连带起村落日常生活，包括亲邻关系、家族关系以及周边的村际关系等，对于民间传统习俗的传承、现代乡村文化的重塑，都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
孙膑在此写书

孙膑生卒年不详，本名亦不详，孙氏族谱称其为孙伯灵，出生于阿、鄆之间，即今东阿县、鄆城一带。

孙膑受封鄆邑历史有载。鄆城，也就是今天昌邑市永安至龙池一带。现龙池有鄆邑故城遗址，遗址上分布着大量西汉至汉代的陶片、古井、古墓及古盐业遗址。

其实，“孙膑居鄆”的故事，地方史志中的痕迹也不少。

清顺治十八年《昌邑县志》卷五《功封》记载：“孙膑，齐军师……威王封于都昌为食邑。”就是说，马陵之战后，齐威王将都昌（今昌邑）赐予孙膑为封地。

乾隆《昌邑县志》记载：“孙子庙在县西

往更能快速提升自身的知名度。

“能带来游客就是最高指标。即便消费者不认可，也总会被植入印象，引来些许人流。改名字是企业的主权行为，只需去工商部门办理，再到文旅部门备案即可，简便得很。对于急于打开发展局面的经营主体，这不失为一个‘取巧’的捷径。”省内一旅游公司的负责人对记者坦言。

但比起改名，众多旅游景区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工作要踏踏实实地去做。中国质量万里行消费投诉数据曾显示，服务质量差、门票优惠执行不到位、经营者未能按时组团、购票遭遇“捆绑搭售”、旅游购物被宰、山寨旅行社以及“黑车”拉客现象等依然存在。无视这些问题，只求行动立竿见影，那么那些背离发展规律的“突进”，往往只会热闹一时、影响有限，很快一切归于平常，甚至生出些啼笑皆非的教训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比起改名，做好“后续配套”，让景区真正“名副其实”才是正路。“天下第一泉”的更名包装就值得借鉴：改造中，经营者在命名、宣传、产品开发上形成一个品牌化的方案，新名字有了，管理、门票、宣传都跟上，还全面升级了景区的景观环境和服务质量，甚至对景区交通、游览、安全等数百个小事项进行系统提升，这些工作做到位，景区当然就非吴下阿蒙，需刮目相看了。



天下第一泉——趵突泉

陈丽华和陈奶奶是其中一对母女。1994年，陈丽华回到日本奈良寻亲，然而语言不通，环境不友好，艰辛的生活里，只有中国母亲的一封信封来信给孤独的心带来抚慰。十几年后，陈丽华的信忽然断了——陈奶奶一直悬着心，不知道女儿的生活遭遇了什么。2015年，陈奶奶踏上奈良之旅，寻找女儿。

整个寻找过程，像一场非常缓慢、非常轻声的叙述。陈奶奶连女儿到日本后起的日本名字都不知道，只能靠攒起来的信件，到旧地址去询问。随着一个个打零工干苦活地址的不断转换，母亲阅读着女儿在信里描述的那些“很好”“不错”，原来都只是为了让让她宽心的谎言。当年的战后遣孤回国后，普遍遭遇了不信任、歧视，在女儿打过工的一家餐馆里，只要丢了东西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她，而为自己辩解却是那么力不从心。

寻觅，母亲在女儿走过的路、寄居过的屋檐下，寻找到那么多被隐藏的艰难。这份艰难里，有不被接纳的心酸，也有再也无法融入另一个国度的悲伤。虽然国籍改成了日本，可从心理到思维都是彻底的中国人，她仿佛再次失去了故乡和亲人，在漫长的流浪里，无法安顿。陈奶奶遍访奈良的归国者，看到的是类似的心路历程——有人永远只会说东北话；有人在偏僻的山乡里，拉着二胡包着饺子，开心或者不开心都要唱上几句智取威虎山……

人生与家国的命运交织，成为故事背后的主题。从父辈被迫背井离乡到东三省“移民”，到被留在黑土地上如同“弃婴”，再到回归日本却举目无亲，甚至有些还被怀疑回来是为了分家产，每个大历史中的“归国者”都像是一遍又一遍被遗弃，成为一个个精神上的漂泊者。战争给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家庭带来的创伤，在这个温柔细腻的故事里，被拉得漫长又沉重。即使许多年过去，痛苦波及的人生始终未曾得到治愈。

导演鹏飞拍摄的这部影片始于反战，但没有止于反战。整个寻找过程中，故事还关怀着普通日本人亲情与故乡的失落，老去的孤独。参与寻找的退休老警察是被时光剩下的人，仿佛丧失了所有价值和意义。他每天都看看院子里的信筒，盼着在东京工作的女儿有信来。然而并没有——年轻人用亲蜜作为代价换来独立的生活，离开故乡漂泊付出的代价是根的断裂。所有被辜负的亲情温暖，都深深烙疼了人们的心。两种“失去”互相渗透、观望，形成了悲伤与悲伤之间凄恻的理解。

最动人的一幕，是两位老人坐在奈良乡下的长椅上。影片有种秋日特有的寂静，这种寂静与春夏不同，它仿佛开始慢慢向时光内部走去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进入某种静谧。他们交换年轻时的照片，花镜摘了又戴戴了又摘，动作缓慢吃力却又彼此殷勤，默默地形成了老年人间独有的理解和彼此宽慰。几分钟的宁静，风吹动奈良的秋天，发出细密的簌簌声。女儿都不见了，孤独的父亲和母亲成为时光的守护者，也是亲情中被剩下的人。

陈丽华始终没有找到。她或许早已在最底层的生活里去世，或者断绝了与故乡母亲的脐带，无奈舍弃。陈奶奶的奈良行，仿佛第二次失去了女儿。在整个故事轻拿轻放的讲述中，历史的沉痛与现实的沉重彼此吹拂，发出辽远的回响。

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功遂身退，天之之道也。”孙膑的时代虽早已经离我们远去，但水满则溢、月满则亏，功成后身退，明哲以保身，著述以遗世，其境界、修为至今仍引人沉思。



□ 王文珏

《又见奈良》，今年上映的内地佳片。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影片的提名，也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进入特别展映单元。切口非常小——一位东北老母亲远赴奈良，寻找自己在战后抚养的日本女儿；余韵很绵长——看完良久，耳边依然回荡着奈良细细密密的风，还有那首黑夜长街上响起的《再见，我的爱人》。

日本侵华战争期间，曾多次组织“开拓团”移民东三省。1945年日本战败，几千名战后遣孤就这样留在了黑土地，被一个个中国家庭收养。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后，许多遣孤返回日本寻找亲人，他们中有的难以适应新的环境而返回中国，有的耗尽一生的气力再次扎根，又挂念着远在中国的家人。

陈丽华和陈奶奶是其中一对母女。1994年，陈丽华回到日本奈良寻亲，然而语言不通，环境不友好，艰辛的生活里，只有中国母亲的一封信封来信给孤独的心带来抚慰。十几年后，陈丽华的信忽然断了——陈奶奶一直悬着心，不知道女儿的生活遭遇了什么。2015年，陈奶奶踏上奈良之旅，寻找女儿。

整个寻找过程，像一场非常缓慢、非常轻声的叙述。陈奶奶连女儿到日本后起的日本名字都不知道，只能靠攒起来的信件，到旧地址去询问。随着一个个打零工干苦活地址的不断转换，母亲阅读着女儿在信里描述的那些“很好”“不错”，原来都只是为了让让她宽心的谎言。当年的战后遣孤回国后，普遍遭遇了不信任、歧视，在女儿打过工的一家餐馆里，只要丢了东西，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她，而为自己辩解却是那么力不从心。

寻觅，母亲在女儿走过的路、寄居过的屋檐下，寻找到那么多被隐藏的艰难。这份艰难里，有不被接纳的心酸，也有再也无法融入另一个国度的悲伤。虽然国籍改成了日本，可从心理到思维都是彻底的中国人，她仿佛再次失去了故乡和亲人，在漫长的流浪里，无法安顿。陈奶奶遍访奈良的归国者，看到的是类似的心路历程——有人永远只会说东北话；有人在偏僻的山乡里，拉着二胡包着饺子，开心或者不开心都要唱上几句智取威虎山……

人生与家国的命运交织，成为故事背后的主题。从父辈被迫背井离乡到东三省“移民”，到被留在黑土地上如同“弃婴”，再到回归日本却举目无亲，甚至有些还被怀疑回来是为了分家产，每个大历史中的“归国者”都像是一遍又一遍被遗弃，成为一个个精神上的漂泊者。战争给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家庭带来的创伤，在这个温柔细腻的故事里，被拉得漫长又沉重。即使许多年过去，痛苦波及的人生始终未曾得到治愈。

导演鹏飞拍摄的这部影片始于反战，但没有止于反战。整个寻找过程中，故事还关怀着普通日本人亲情与故乡的失落，老去的孤独。参与寻找的退休老警察是被时光剩下的人，仿佛丧失了所有价值和意义。他每天都看看院子里的信筒，盼着在东京工作的女儿有信来。然而并没有——年轻人用亲蜜作为代价换来独立的生活，离开故乡漂泊付出的代价是根的断裂。所有被辜负的亲情温暖，都深深烙疼了人们的心。两种“失去”互相渗透、观望，形成了悲伤与悲伤之间凄恻的理解。

最动人的一幕，是两位老人坐在奈良乡下的长椅上。影片有种秋日特有的寂静，这种寂静与春夏不同，它仿佛开始慢慢向时光内部走去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进入某种静谧。他们交换年轻时的照片，花镜摘了又戴戴了又摘，动作缓慢吃力却又彼此殷勤，默默地形成了老年人间独有的理解和彼此宽慰。几分钟的宁静，风吹动奈良的秋天，发出细密的簌簌声。女儿都不见了，孤独的父亲和母亲成为时光的守护者，也是亲情中被剩下的人。

陈丽华始终没有找到。她或许早已在最底层的生活里去世，或者断绝了与故乡母亲的脐带，无奈舍弃。陈奶奶的奈良行，仿佛第二次失去了女儿。在整个故事轻拿轻放的讲述中，历史的沉痛与现实的沉重彼此吹拂，发出辽远的回响。

